

有明一朝的江山,从额上裹红巾开始,到歪脖子树上吊死,277年不算少,但与朱元璋千秋大业的宏愿相去甚远。

残阳下的明祖陵

——“车轮上的行囊”之四十五

□黄俊生

心在路上

马上江山,怀里美人。

一个朝寻炊烟暮投破庙的叫花子,披上龙袍,坐上龙廷。大明朝的突起,简直是一场难以置信的梦幻。让这梦幻成真的,是一个名叫朱重八后来叫朱元璋的农民。这是中国农民的辉煌,是中国农民运动的巨大胜利。但是,农民的胜利,并没有让农民的命运发生改变,他们依然在苦难的圈子里循环往复、周而复始地演绎着沉痛。中华大地依然是野草逐风,飞鸟走兽,广袤的田野蔓延着洪水泛滥的痕迹,枯瘦如柴的人和牛在贫瘠的土地上勉力耕种。然而,就在这苍山白水烟雨迷茫的古泗州,却兀地突起一座雕栏玉砌、金碧辉煌的陵寝,用以昭告天下:朱家的江山非人力夺得,乃托庇祖坟冒烟,受命于天。这座陵寝就是坐落在盱眙市淮水畔的明祖陵。

漫步在明祖陵,已见不到当年的气派和规模,面对修复不了的破败,我首先想到的,不是大明的灿烂,而是它的暗淡。大明的兴起是令人鼓舞的,它毕竟把农民的履历写进皇家史册;但它的灭亡又是令人盼望的,因为它带给农民的苦难并不逊色于任何一个王朝。

朱元璋是一个杀伐气很重的皇帝,一生杀人无数,火烧功臣楼要比杯酒释兵权的血腥味重了许多,残忍了许多。为了朱家的千秋大业,也为了扫清皇孙建文帝执政道路上的障碍,一连串的肱骨重臣诸如胡惟庸、李善长、蓝玉被满门抄斩,诛灭九族。但他毕竟才刚刚完成从农民到皇帝的身份转换,那些给人放牛、沿途乞讨、受戒出家、马上征战的往事仍历历在目,知道民可载舟亦可覆舟的古训,还是勉力地推行了一些休养生息新政,提倡节俭,严惩奢华,可见他确实是一位雄才大略的英武之君。不过,他自己在无情地向贪官污吏挥舞青锋的同时,却把泗州的祖陵和凤阳的皇陵修建得规模宏大,气势雄伟。

明祖陵是朱元璋的祖父朱初一、曾祖父朱四九、高祖父朱百六的衣冠冢,也是朱初一的实际埋葬地。明祖陵从洪武年间起建,到永乐年间建成,历时28年,号称“明代第一陵”。我到明祖陵时,恰是夕阳西沉,昏鸦聒噪的时光,夕阳透过黄昏的薄雾在疏林树梢、享殿屋尖、翁仲双肩、金水桥栏、神兽甬道上涂上一层凄美的烟尘,我看到一位伟岸男子,踏着元朝惨淡的末世走来,一路走上金銮殿。在这位马脸君王心里,明镜似的明白一个道理,花的凋落远比花的盛开容易得多。修建祖陵,不单是渲染明王朝的显赫,更是用祖上的风水来解说九五之尊的必然——尽管他不一定相信这帝业竟是祖



上给的。或许,在某个多梦的春夜,他忽然从噩梦中惊醒,想到假如张士诚还活着,他的老丈人郭子兴还活着,中国的历史上还会出现他这个草根皇帝吗?他从臣子们三呼万岁时掀起的屁股上似乎看出意欲挪上龙椅的企图,洞察到他们“你个和尚能坐得,我为何坐不得”的内心活动,于是,他祭起君权神授、祖坟冒烟的大旗。

其实,朱家真正的祖坟在哪里,对一个出生在逃难途中、被父亲朱五四用箩筐一路挑到凤阳的朱元璋来说,是不知究竟的。那时,被异族统治着的汉人连正儿八经的名字都没有,怎会有确切的祖坟所在呢?更何况是三代祖宗的骸骨安葬地。有人进言,说句容通德乡朱家巷就是。朱元璋大喜,亲往拜谒,谁知刚磕了一个头,万岁山竟然中间分为深涧!朱元璋大怒:为何我家祖茔,受不起我一拜?为此,朱元璋郁闷了多少年。直至洪武十七年,才有一个叫朱贵的献上图表确切地说泗州城外淮水畔的杨家墩就是朱家祖茔。于是,在宋朝当官的两个杨姓骨骸被刨了出来,让给朱家筑祖陵。朱元璋着皇太子朱标建明祖陵,着四皇子朱棣建燕州皇城。朱标一生只干了这一件事,而且还没干完就伸了腿。倾皇家之力,跨越洪武、建文、永乐三个年号,方始在本来荒凉至极泥沙一片的淮水滩边,崛起一座殿阁嵯峨、城墙三道、屋宇无数、松柏七万、翁仲21对的宏大陵园。不过,朱元璋毕生没有到过祖陵祭祖,大概他根本就沒信过这里会葬着朱家先祖,更没有相信他的帝业会出自这前有淮水后有漫坡的杨家墩——倘若如此,从这坟茔中走出的帝

王该姓杨而不姓朱了。也许,我们可以从他亲自撰写和勘定《祖训》《宝训》《大诰》和在《朱氏世德碑记》中的殷切训诫能体会到他的拳拳用心:“凡我子孙,皆当体祖宗之心,蹈德存仁,以永其绪于无穷,是吾所望也!”

历史烟云,时光流水。清康熙十九年,黄河夺淮入海,淮南淮北一片汪洋,古泗州城沉入水底,成为中国的一座“庞贝城”,明祖陵也随之没入水下,朱氏先祖成为水中鱼虾的养料。1953年春旱,明祖陵从水底露头,当地人们称为大墓头;1963年再次露头,就在人们要破四旧的时候,一场大雨又把它埋入水中;1976年三次露头,被考古人员认出了明祖陵的身份加以保护,1982年修缮初具规模,1996年列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然而,巍峨宫殿和七万树木已荡然无存,皇家陵苑的威赫气势也淹没在泥泞滩涂和杂乱杂草之中,唯有200多米长的神道和21对人兽石像上的精美雕刻还记录着当年的繁华和气象,万岁山前的水潭下浸渍着朱氏先祖的白骨衣冠,严守着600年残缺的梦境。

夜色已涂在明祖陵的黄瓦红墙上,夕阳沉入淮河尽头,我依旧在石人石兽夹道的神道上徘徊,茂密的松林间,数点寒鸦哀哀啼鸣,勾起我一段苍凉情怀。我在想,有明一朝的江山,从额上裹红巾开始,到歪脖子树上吊死,277年不算少,但与朱元璋千秋大业的宏愿相去甚远。朱元璋做不到,赵匡胤做不到,李世民做不到,就连渭水垂钓、愿者上钩的姜子牙也只能保得西周八百年江山,只有到了老百姓真正当家做主的那一天,这残阳的凄迷才会染上炫目的辉煌!

在电影放映时,换片子的时候,人们总会看到他突兀地站起来,将焦虑的目光投向放映员,无声地催促着。

露天电影(之二)

□刘剑波



小镇忆旧

小镇人往往都是在下午获悉“东海部队”晚上要放电影的消息的,而这个消息都是由在马路玩耍的孩子带来。它犹如鸟的翅膀,不停地扑闪着,在小镇的上空飞来飞去,掠过每个人的头顶。一想到晚上就有电影看,整个小镇便洋溢起一种掩藏不住的喜悦、亢奋的气氛。人们走路脚步变轻了,平时说话大声大嗓,吵得半条街都能听见的人,声音也从C调降到G调,甚至B调。往日有芥蒂,老死不相往来的人,在街上碰到,也不由自主地相互打起招呼来:“去看吗?”“去啊,你呢?”“当然去,看电影都快饿死了。”“不晓得个打仗。”“那些伢儿说是打仗的,就是不打仗,看看也好耍子的。”

然而,不少人觉得天黑前这段时间是最难挨的,日头钉在天上一动不动,时间仿佛凝固了,一分钟比一小时还长,兴奋的情緒一落千丈。大家焦躁不安,又由焦躁不安变得易躁易怒。会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情。现在回想起来,记忆如泥沼里撒开的红丝带,若隐若现,无头无绪,然而属于曹金元和郭振家的那两段总能如抽丝剥茧般脱颖而出——

曹金元挑水喜欢打号子,即便挑着两个空桶,嘴里也不闲着。没有原因,往小处说是习惯,朝大处讲是生命的本能。曹金元打号子不是直着嗓子吼两声就算完事,他打号子能打出个花儿来,像内蒙长调,拖得很长,音调抑扬顿挫,跌宕起伏,带着忧伤的哭腔,像是在倾诉一个凄凉哀伤的故事。有人说,曹金元打号子,其实是在叙说自己悲惨的身世。很多人都喜欢听曹金元打号子,他们说,金元,金元,你能当歌唱家了。曹金元听了笑笑,又继续打他的号子。

他们说,金元,金元,你把号子再打高点,就有女人跟你了。金元听了笑笑,又继续打他的号子。可是那天下午,曹金元的号子让大家烦透了,他们说,金元,金元,你要死啊,号子打得这么响。曹金元听了笑笑,又继续打号子,挑着满满两桶水,渐行渐远。

八鲜行斜对过有家不起眼的小百货店,卖些针头线脑,梳子镜子,学习用品什么的。店员有两位。一位是吴鹤松的老婆,我一直不知道她的尊姓大名,只记得她皮肤极白净,脸上有几颗碎麻子。她极其痛子,为人良善,说话轻声细语,一脸笑模样,待人接物永远表现出极大的耐心,顾客都喜欢在她手上买东西。另一位叫郭振家,将近六旬,年纪不算大,但老相,给人的印象是垂垂老矣。除了盛夏,他都穿一件兼具保暖和挡尘的类似风衣那种的灰色袍子。他脾性乖戾,忧郁,阴沉,不苟言笑,有点像契诃夫笔下的沙俄时代的人物。从我少年时代的视角瞧他,总觉得他的业余生活有点无聊,有点苍白,但看电影是他的一大喜好,其劲头不输年轻人。在电影放映时,换片子的时候,人们总会看到他突兀地站起来,将焦虑的目光投向放映员,无声地催促着。很多观众受他影响,都纷纷立起,在无数目光交织而成的火力网中,换片子的放映员简直如芒在背,手脚忙乱。而当片子终于换好,灯光熄灭,他总是最后一个坐下,他的清瘦、佝偻的身影打在银幕上,与银幕上的人物混杂在一起。似乎是某个观众拉了他一下,他才剥离了银幕人物。

他是外地人,口音怪怪的,比如,他说“一角钱”,听上去却是“一桌钱”。那天下午他当班,盼着早点打烊,好提早到电影场占个位置。柜台上有个待售的座钟,上了弦,秒针有一搭没一搭地走着,可分针看上去纹丝不动。郭振家急坏了,恨不得用手去拨。这时,有顾客进来买松紧带。这是个从未见过的陌生顾客,赤脚,腰里束一根麻绳,脸膛黝黑皴裂,身上有股鱼腥味。小镇上经常出现这些来自海边的下海人,小镇

人都叫他们“海巴子”。

这位“海巴子”跨进店门,嚷着要买三尺长的松紧带。下午,小百货店的生意总是清淡的,往往这个时候,郭振家就会耷拉着眼皮,倚在柜台上,听收音机里唱《红灯记》或《智取威虎山》。他关了收音机,娴熟地扯了一根松紧带,按在柜台边上量了量,用剪刀剪断,挽成团,递给顾客,嘴里说,“一桌钱。”也许是声音模糊,顾客没听明白,问了声,“多少钱?”他提高了嗓音。他的嗓音一高,就沙哑得像磨砂玻璃,“一桌钱!”这次顾客听懂了,惊讶得反问,“买根松紧带要一桌钱?它是金子做的还是银子做的?”如果在平时,郭振家会耐心解释,“一桌钱”其实就是“一角钱”。有些顾客听不懂,他甚至会用食指沾上吐沫,在玻璃柜台上一笔一画地写出来:“一角钱。”可是那天下午,他一心惦记着晚上的电影,而缓慢流逝的时间让他越来越不耐烦,所以他冲着顾客吼了声:“你不买拉倒!”

一般而言,“海巴子”来镇上神情都是有点自卑的,觉得镇上人高人一等,因此跟镇上人说话都很小心,语气低三下四,但这位顾客却是异类,郭振家的态度刺痛了他,他无论如何咽不下这口气,拣最脏最恶毒的话说。郭振家骨子里是个文气的人,他或许是平生头一次遇上这阵势,他大张着嘴,可是一句话都说不出。他目瞪口呆,像泥塑木雕。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那来自海边的顾客有人来喊,捡起门口的一块砖头,举过头顶,要砸了柜台。很多人都都在心里喊,砸呀,快砸呀!

这场风波最终是由吴鹤松平息的。“海巴子”都怕吴鹤松三分,道理很简单,他们卖到八鲜行的文蛤,价格和成色都由吴鹤松说了算。目击者说,当那位顾客看到吴鹤松从八鲜行走过来,便随手将砖头扔了。吴鹤松无疑是认识他的。吴鹤松喊了声他的绰号,“二强盗!”“二强盗”立马满脸堆笑,垂手而立。吴鹤松以“晚上还要看电影”的理由驱散了围观者。是啊,还有什么比晚上看电影更重要呢。

然而,很多人发现,那天晚上郭振家并没有去看电影,在换片子时,他清瘦佝偻的身影也没有打在银幕上。



一具好灯足可诠释一个王朝。繁复也好,清减也罢,都成了历史文化生动的注脚。

千门开锁万灯明

□强雯



博物奇妙

“别有一千金笑,来映九枝前。”天寒地冻,百物萧条,唯有万灯明耀,能把家家户户门锁启开,将人心紧紧攥住。

灯是火的变异,是光明和温暖的所在,中国有史以来,从上至下,在灯具上倾注了不少心力。

青铜灯出现于战国中期,在秦汉两代流行,式样众多,用途细化。行灯便是专用于夜间导行,多作浅圆灯盘,直口平底,下有三矮足,一侧有执柄,自铭为“行灯”或“行烛灯”。

战国时期的青铜凤行灯、人骑骆驼灯,都是青铜时代的代表作,尤其是后者,历史上,以骆驼为灯座的铜灯极为罕见。河北出土的长信宫灯,现已是中古文化的代表作,长信宫灯通高48cm。灯的形象为跪地执灯的年轻宫女,通体鎏金。宫女左手持灯盘,右臂上举,袖口下垂成灯罩。灯盘可以转动,灯盘上的两片弧形屏板可以推动开合,以调节灯光的亮度和照射方向。宫女身体中空,烟灰经右臂进入体内,以保持室内清洁。灯的各部分还可以拆卸,有利于清洁。整个造型自然优美、舒展自如、轻巧华丽,是一件既实用、又美观的灯具珍品。南朝出土的人骑兽行铜灯,隋朝的青瓷五管烛台,是一个倒扣的莲花状,敦实可爱。东汉的铜牛灯牛角无限延展,正好组成弧线,把灯台围了起来。

一个朝代有一盏灯。从灯具可以观看到一个王朝的风格。

灯自古以来,是希望的象征,在岁末年初,若有一场盛大的灯会,既是对过往生活的圆满总结,也是对来年的热情期许。人以及人类,都需要热情来维系对生活的向往。

洛阳古城,是灯会的频发地。大量的诗歌曾经赋予这里明艳动人的一幕。到了公元610年,隋炀帝于正月十五在洛阳端门以外,建国门以内沿街搭起彩绘戏棚,“张灯结彩,火树银花”。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在《旧唐书》里,记唐玄宗先天元年(712),“初有僧婆请夜开门燃灯百千炬,三日三夜”,可以想见其光明夺月色的热闹。

到了宋代,登峰造极,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着北宋都城开封灯节“歌舞百戏”“灯山上彩,金碧相射,锦绣交辉”的盛景民俗。沧海桑田,到了清代,因为满人入主中原,官方不再举办灯会,但民间方兴未艾。

偏僻巴蜀一带的自贡,虽然道路相阻,但灯会之兴隆也吸引了外国人的注意。清代,自贡荣县的灯会被载入史册。在民国赵熙版的《荣县志·灯火》中记载“西人观方欣然,京沪所不见”,“缙索诸技唐宋俱详焉”,其繁华超过北京、上海,还有踩钢索一类耍耍。而荣县牛王永庆会碑,铁山道上的石笋铺杨泗崖上荣县天灯会碑记摩崖石刻、自流井区仲权镇南华宫歇舍万年天灯碑记、贡井区五皇灯会石碑上,都能看到当年盛景。

1964年,自贡举办了新中国成立后的首次春节灯会,展出的1225支彩灯巧妙地布展于公园湖面,名胜灯、花鸟灯、宫灯等,正式拉开了自贡灯会传统的序幕。1988年6月16日,自贡灯会在北京北海公园举办中央首长专场展出活动,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前往观灯。在北海公园观看了自贡灯展后,新中国成立后,四川自贡便开始筹办全国性灯展。每年春节前,自贡都会举行长达三个月的迎新灯会。

每年灯会,全国各地的游客都会远道而来,体验中国传统盛事的美好。

大概基于此,1992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建立,中国彩灯博物馆花落自贡。这座中国乃至世界唯一的关于彩灯文化的专业博物馆,1994年正式开放。此地也成为中国彩灯“收藏、保护、研究和展示”的专门机构。

中国彩灯博物馆本身也是一尊艺术品。建筑由原建筑部高级顾问、已故建筑大师戴念慈先生主持评审,按东南大学建筑系设计方案修建。整个建筑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和灯文化专业博物馆的特点,曾被评为中国建筑设计最高奖“鲁班金奖”。

我在中国灯文化历史厅中漫步、观摩,博物馆工作人员告诉我,“自贡以外出土的历史灯具,是原样复制品,如长信宫灯原件,现藏河北博物院,虽然这些是原样复制,都是得到当地博物馆、博物院许可了的。”

这虽让人不免遗憾,但我知道所有铺垫都是为了高潮——自贡灯会。

为了节省成本,灯展上的灯,寿命通常只有三个月,所以材质并非最好,而博物馆要陈列同样造型的灯,寿命要求至少一两年。而且在露天场合里展示的灯具要高、大、繁复,适合户外的不一定适合博物馆,有些是比例缩小的。

有“灯王”之称的瓷器宫灯王,就是如此。它既是往年灯展上的宝贝,也是中国彩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为了将其挪到博物馆,只能原比例缩小一半,重新制作了一尊。令人咂舌的是,这具宫灯全部用陶瓷勺、碟、碗捆绑而成,勺中有碟,碟中有勺,无任何胶水粘连,大大小小器具组合,全由景德镇定做。小宫灯顶端是一玉龙,目、嘴、鼻表现细腻,颈上长鬃高耸,体态矫健。宫灯的边框均由瓷器组建而成,八角样式,底部则是由瓷器搭建的几个龙头,眼睛是灯,会眨会闪。灯面上则是飞天。这个灯王以其体型高大、瓷器装饰精密繁复而著称。

风靡全球的《冰雪奇缘》《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其故事场景十分讨喜灯会。冰雪公主、小矮人们欢喜而浪漫的灯光造型,几乎人人入爱。可是,最难得的是人物的面部发光。让人体和面部内部发光,过去用的是泥塑造型,在刷上一层玻璃,可惜的是这种光很快就容易坏掉,透光性差。用布艺造型是近几年技术革新带来的转变。布艺透光性好,就是人物造型偏难,不过冰雪公主和小矮人们的造型逼真,看起来,完全解决了过去的难题。

直到今天自贡市仍有22处以“灯”或“灯杆”命名的地名和灯会遗址。如富顺县的点灯山、灯杆坝,贡井的万年灯、灯杆坝;荣县的天灯坝、灯夹林等。

每年灯会,山西平遥和浙江海宁都有参展作品。海宁的灯具精致小巧,擅长用针扎技术绘画造型,古代的天伦之乐针扎成绣像图,围成灯笼的四面或六面,远看还以为工笔画。因为精致,海宁的灯展作品都不太大,更适合放在博物馆里陈列,但凑近了看,却是针针精湛,细节都经得起推敲。海宁的宫灯,崇尚素雅,有青花瓷之风,古画本绣像之态。

平遥的灯,则多是中国农村风貌,比如丝扎工艺的羽人捧圈,用黄绿色搭配,传统项目龙灯,都采用了极为浓烈的金黄、大红色,让人活生生想起山西民歌、黄土高原、落炕的人与缺口土碗。糖果灯五彩缤纷,挂满了三楼和四楼的空间,混杂着唐朝明月和日式和风的气息。拾级而上,蓦然回首,东风夜放花千树,余兴难尽。

灯会在元宵夜达到极致。风流才子唐寅挥毫“有月无灯不算春”,这也道出了大众节日赏灯的情趣与乐趣。

一具好灯足可诠释一个王朝。繁复也好,清减也罢,都成了历史文化生动的注脚。